



走进运城博物馆

赏文物之珍 溯华夏之源

本报记者 付明丽



▲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彩陶盆。
▼外国观众在运城博物馆欣赏精美文物。

运城博物馆供图
兰立强摄（人民图片）



▲“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览现场。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供图

运城城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因地处黄河以东，古称“河东”。运城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这里流传着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螺祖养蚕等古老传说，留存有永乐宫、后土祠、解州关帝庙等遗迹，孕育出关羽、王勃、司马光等文武俊秀。全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2处，涵盖从史前至明清多个历史时期。

运城博物馆坐落于运城市盐湖区魏风街，从空中俯瞰，建筑整体造型似摇篮，寓意“文明摇篮”；远看又像扎根于黄土高原的老树根，凝聚着沧桑历史。

运城博物馆实行总分馆运行管理机制，共有藏品13万余件，年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至现代。总馆基本陈列以“大河之东”为主题，由华夏寻根、馆藏珍品、盐盐春秋、地灵人杰、土木华章、条山风云6个专题展组成。

见证中华文明起源

步入馆内，一面陶片文化展示墙吸引观众驻足，10层陶片从仰韶文化层到近代文化层，将数千年文明史浓缩于一墙。

走进“华夏寻根”展厅，一件世纪曙猿下颌骨化石的仿制品映入眼帘。化石出土于运城垣曲，距今约450万年—400万年。通过放大镜能清楚地看到下颌骨犬齿较大，下颌角较圆，下巴前缘呈直立状，符合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特征。“世纪曙猿的发现，把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起源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改写了包含人类远祖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起源于非洲的说法。”运城博物馆馆长王大奇说。

运城地区是远古人类活动密集之地，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173处，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距今约243万年的芮城西侯度遗址。展厅里展示了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说明西侯度先民已经有了分类清晰的石制工具。

运城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约600处，以芮城东庄遗址、夏县西阴遗址、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等为代表。独立展柜中陈列着芮城东庄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属于仰韶文化早期典型器物，棕红色陶衣上绘黑色三角形纹，纹饰规整，色彩鲜明。“这件彩陶盆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为同一时期器物，造型、纹饰相似，说明6000年前黄河两岸先民已有较为深入的文化交流。”王大奇说。

师村遗址也是仰韶文化早期重要遗址。展厅中展示了该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仿制品，整体呈黄褐色，带黑褐色斑点，形态逼真。100年前，夏县西阴遗址出土了有人工切割痕迹的半个蚕茧；近年来，运城多个遗址相继出土石雕或陶制蚕蛹，年代涵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这些发现为研究中国丝绸起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印证了5000多年前河东先民已开始育蚕制丝，与“螺祖教民养蚕于夏县”的传说相吻合。

夏县东冯遗址、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垣曲商城遗址、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绛县横北周国墓地等夏商周时期重要考古发现，对探索早期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展厅中陈列着一系列文物，诉说着河东地区青铜时代的辉煌：夏县辕村遗址发现的青铜爵为二里头文化器物，是早期青铜礼器的代表；平陆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方鼎、青铜圆鼎，为商代早期典型器物，推测是用于祭祀黄河的礼器；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的陶质鼓嘴是铜矿冶炼所用工具，

该遗址发掘出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反映了夏商时期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冶铜技术。

“从史前到夏商周，运城历史文化序列清晰、框架完整，考古发现与史载传说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运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王大奇说。

展示河东盐文化

“一池河东盐，半部华夏史”。运城盐湖又称“河东盐池”，有4600多年盐业开采史。盐湖资源滋养了华夏先民，促进了商业繁荣和早期国家的形成。

据文献记载，古人将河东盐池称为“盐”。“盐盐春秋”展厅讲述了盐池的发展史，包括“盐池变迁”“百业俱兴”“晋商之源”三部分。

盐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资源，盐湖周边数千平方公里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密集分布地带。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解县（今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盐池是古代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

春秋时期，齐国开创了盐业官营、利归国家的模式。秦汉以来，盐利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到了唐代，“畦畦浇晒”制盐技术发展成熟，池盐质量和产量均有提高，河东盐池的年赋税一度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元代末年，在盐运使司驻地设专城管理盐务，这便是“运城”之名的由来。经过多次增修扩建，城池建筑日渐完备，成为河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馆内展示的北宋标准衡器“店下秤”、清代戊申较准天平九五秤砣等文物，是研究古代盐政、税收与商业的珍贵实物。展厅里以场景营造的形式还原了畦畦浇晒法和元代姚行筒修建盐运司、明代修筑盐池禁墙等，再现了河东盐池的繁荣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运城盐湖成为盐化工厂原料基地。2020年，运城启动“退盐还湖”计划，停止盐湖保护范围内一切工业生产活动。今日盐湖已转型为集文化、旅游、生态于一体的景区，“晒盐技艺（运城河东制盐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彰显古建艺术魅力

运城市拥有许多宝贵的古建筑遗产。“土木华章”展厅选取运城具有代表性的十几处古建筑进行展示，以建筑模型为主，辅以丰富的图表、照片和壁画复原、场景再现等，串联起运城古建从隋唐到明清的演变脉络。

泛舟禅师塔是唐代圆形单层砖塔，基座、塔身与塔刹过渡自然，工艺精湛，展出的建筑模型精确还原了塔身的“黄金分割”比例。广仁王庙是



▲观众在展厅里体验电子互动设备。
运城博物馆供图

中国现存的4座唐代木构建筑之一，宽阔的屋檐、雄大的斗拱、简练的线条，反映出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万荣稷王庙正殿是国内现存唯一的北宋殿顶木构建筑，好似一把撑开的大伞，气势十足。元代道教宫观永乐宫以精美绝伦的壁画享誉中外，展厅里呈现了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东壁壁画等比例复制图，神仙画像“列队”眼前，复现了“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

“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这句民间俗语生动表现了飞云楼的巍峨气势。飞云楼现存主体为明代所建，楼高23.19米，外三层、内五层，通体无一根铁钉，全靠345组造型各异的斗拱榫卯精密衔接。展厅里的模型还原了飞云楼复杂的斗拱结构，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古建筑之精妙。

运城还有大批敬奉各类祖先贤圣的古代祠庙，如承载古老女娲信仰的后土祠，奉祀农耕始祖后稷的稷山稷王庙、闻喜后稷庙等，以及被誉为全国“武庙之冠”的解州关帝庙等。这些古建筑是根植文化和农耕文明的鲜活载体，见证着中华文脉赓续不绝。

（杨清雯参与采写）

◎记者手记

纵览历史，一眼千年

周人杰

千年前，唐代诗人王之涣登临鹳雀楼，望黄河东流，写下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名句。如今，当人们走进运城博物馆，亦如登高望远——一件件珍贵文物在眼前铺展开来，清晰勾勒出源远流长的文明脉络。

从仰韶文化彩陶盆到宋金时期河津窑白釉褐彩诗文枕，华夏民族的审美意趣在火与土的淬炼中焕发精彩；从二里头文化青铜爵、商代前庄方鼎到春秋虢国鸟盖铜壶，青铜重器承载着礼制文明的密码，见证着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从精雕细刻的唐代石椁到栩栩如生的元代关公铜像，一代代工匠的巧思与技艺薪火相传，不断书写着创新创造的故事。

近年来，运城博物馆以社教为桥连通心灵，每年接待上万名学生参加研学活动，文物拼图、模拟考古等体验项目，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读懂历史、感悟文明；以科技赋能“激活”文物，推出AR智慧导览，虚拟讲解员“阿盐”为观众360度解析青铜纹饰、再现古代盐池生产场景；以网络为媒传播文化，线上云展览打破时空界限，让更多人足不出户就能欣赏文化瑰宝。

根魂相连，文脉永续；好运之城，生生不息。古老的河东文化正以鲜活姿态，跨越时空与山海，走进大众视野，融入时代生活，焕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



▲观众欣赏飞云楼建筑模型。
茹雅摄（人民图片）

战国秦汉时期云南文物珍品进京展出

呈现云南青铜时代璀璨图景

朱彬彬 邹雅婷

近日，“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开展。

此次展览由首都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汇聚了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珍贵文物400余件（组），其中20%为一级文物，多数展品为首次进京展出。展览通过“星灿云南”“铜铸古滇”“归融华夏”三部分，展示了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各族群璀璨多彩的文化，呈现了云南地区逐步纳入中央大一统管辖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例证。

走进展厅，浓郁的云南地域风情扑面而来。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策展人田辛西介绍，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浸”等族群，他们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与中原及周边地区频繁互动，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

第一部分“星灿云南”展出了云南各部族的生活用具、饰品与兵器。一组鸟形铜杆头饰和动物造型容器颇具特色，反映了滇西地区“昆明族”的文化面貌。据介绍，这一族群以游牧为主，随畜迁徙，兼事农业，青铜冶铸水平较高。

双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的生活用具，便于携带，适合山地篝火烧煮。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的金双耳罐串珠，超越了日用器物的本意，具有尊贵、神圣的意味。

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的铜剑及蛇纹铜剑鞘，鞘面镂空，饰有繁复立体的蛇纹及云雷纹、圆泡饰，体现了独特的青铜艺术风格。

独立展柜中的手持铁剑铜武士像颇为吸睛。它出土于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人物深目高鼻，似戴头盔，专家认为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旁边展示的青铜人物形杖首出土于大理巍山窖藏，人物发型、服饰与手势都带有外来文化印记，反映了当地人与外界的交往。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生活在滇池区域的滇人是云南地区众多族群中最强大的一支，史称“滇国”。展览第二部分“铜铸古滇”以考古发现的丰富文物展现了古滇国的社会百态。

贮贝器是古滇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用于储存货币海贝。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器盖上立雕10名女性，中央跪坐一位贵族妇女，通体鎏金；旁边三侍女分别做捧送食盒、执伞、跪坐伺候差遣状；周围二人，一坐一立，做理线状；另有四人面向中央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

四舞俑铜鼓同样出自李家山墓地，鼓面边缘插饰4个身着盛装的舞俑形象。四人皆佩戴大耳环和多层项链，内着短袖对襟长衫，外着长披风，双臂戴镯，前腹佩圆形扣饰，生动展现了古滇人的服饰风格。

秦汉以来，中原与云南地区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兵临滇池，滇王举国归附。汉武帝保留滇国号与滇王号，同时设立益州郡，云南大部被纳入汉朝大一统行政体系。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滇西哀牢故地设置永昌郡，基本实现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全部统一及郡县制统治。

展览第三部分呈现了西南夷融入华夏、中原文化在云南传播的历史进程。铜孔雀灯造型具有云南地域特色，其设计原理与西汉长信宫灯、雁鱼铜灯有异曲同工之妙。陂池水田模型生动展现了中原地区先进水利技术与云南自然地貌的巧妙结合，是古人因地制宜的匠心缩影。

晋宁河泊所遗址是“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益州”铭文瓦当、大量简牍和封泥等文物，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滇王之印”等相互印证，证明该遗址为益州郡及滇池县官署所在。

展厅里展出了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简牍和瓦当。“‘滇国相印’与‘益州太守章’封泥同时出土，印证了‘郡国并行’的体系，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治理智慧。”田辛西说。益州郡下辖24个县，展柜中可以看到滇池、连然、建伶等20个县的官印封泥，这是中央政权对云南地区实施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实证。

西汉“滇池以亭行”署简牍为文书传递时使用的题署。简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书，“滇池”指滇池县廷，是收信地址；传行方式是“以亭行”，即取道乡亭传递邮书，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邮亭系统。

展览的结尾，陈列着“益州”云纹瓦当。这是汉代官署建筑用瓦，为确认河泊所遗址是汉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提供了关键实证。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



▲西汉四舞俑铜鼓（云南省博物馆藏）。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供图